

为代工厂背锅? 企业用高科技不该是噱头

李 艳

百年老字号也造假? 同仁堂的蜂蜜事件成为了近日最受关注的食品安全事件。

12月15日,有媒体报道北京同仁堂蜂蜜的生产商盐城金峰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大量回收过期、临近过期的蜂蜜,对外宣称“退给蜂农养蜜蜂”。但实际上这些回收蜂蜜被倒入大桶,送入原料库。此外,该公司还存在更改蜂蜜生产日期的问题。

事后同仁堂的声明承认在委托生产过程中存在监管不力和失察的责任,但也“委婉”地把大部分责任推给了代工厂。事实上,2017年就曾有媒体报道北京同仁堂一年六次登上质检黑榜的事件。

在一众老字号中,同仁堂是喜欢强调自身科技属性的企业之一。最近这些年,同仁堂的“创新经”被广为流传——他们如何用现代科学的手段把中药药效表达出来,给人们以科学的解释,“让古方中药搭

上科技快车”;如何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情况下,与时俱进地丰富自己的营销方式;如何在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完善管理流程确保产品质量的报道都曾经见诸报端。根据这些报道,可以认为同仁堂有成熟完善的企业科技创新体系,并且投入重金鼓励各级专业技术人员围绕生产和质量,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革新和技术攻关活动。这些都让同仁堂成为许多想要转型升级、赶上科技潮流的传统企业最想学习的“励志榜样”。

但是,当过期蜂蜜事件爆出,人们才知道,尽管用上了这么多高新技术,对自家产品的生产流程和原料来源,同仁堂居然是“无能为力”的,所以才“监管不力和失察”。一句“代工”似乎就能抹掉大部分的责任。我们都知道因为一层委托关系,使得代工模式隐患重重,质量控制是其中最大的弊端。你看,我只是品牌方,不能时刻监管代工厂的生产流程,

“在一众老字号中,同仁堂是喜欢强调自身科技属性的企业之一。当过期蜂蜜事件爆出,人们才知道,尽管用上了这么多高新技术,对自家产品的生产流程和原料来源,同仁堂居然是‘无能为力’的,所以才‘监管不力和失察’。”

产品出了问题,我是监管不到位,但我也没有办法啊——这听起来似乎合情合理。

当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人工智能、区块链、企业管理新型软件等许多高技术产品都已经非常成熟。一粒大米从播种的那一天开始到最后进入哪一个家庭都可以记录在案;生产全周期的公开透明、数据不可篡改已经不是难题;一个产品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也已经不是梦想。传统的溯源平台信息不透明、数据易篡改、安全性差等弊端和弱点现在都已被新技术克服。

既然如此,被誉为传统企业科技创新典范的同仁堂为什么对一家代工厂会完全“失控”?要知道虽是代工厂,但生产的产品却是实实在在地贴上了同仁堂的标签,送到了千家万户。所以代工不是挡箭牌,“监管不力”也很难成为借口,既然“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是同仁堂至今谨遵的古训,那么同仁堂在科技创新的路上也应该“走点心”“用力点”。

处分“404教授”后 还要修复学术评价体系

朱昌俊

涉嫌多篇论文抄袭、被称作“404教授”的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准80后”梁莹教授涉嫌学术抄袭一事,有了新进展。据南京大学新闻网,近日,南京大学召开的警示教育大会,通报了学校对教师梁莹学术不端等违纪违规行为的处理情况。通报称,经调查并经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教师职业道德与纪律委员会研究,认定梁莹存在学术道德等师德问题且情节严重。

根据通报,对于梁莹的处分包括,行政记过,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将其调离教学科研岗位,终止“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聘任合同等。可以说,这基本上等于“熔断”了其个人学术和教师生涯。

对比近年其他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置,这一处罚力度,应该不算轻了,可谓示范了大学对于学术不端行为的正确态度。但是,一名长年涉嫌论文抄袭、一稿多投,并在教学上也因态度不端而多次遭到学生举报的教授,实在不应该在今天才受到处罚。在对学术造假当事人予以严厉追究的同时,学校的学术净化能力和评价体系,在此事件后能否“吃一堑长一智”,或许更重要。

事实上,几乎是一路靠着学术造假“起家”的梁莹,本不应该走得这么远。比如其2009年进入南京大学任教时,学院内部就曾有不同意见。主要疑点在于,彼时才30岁的她就发表了30多篇论文,以文科的标准来看,可能不太严谨。不是说年轻教师“高产”就一定有问题,但对于有违常态的“成绩”,校方对之予以更谨慎的审视和调查,这才是一种更负责任的态度。如果学校的学术评价体

系,是更看重学术质量而不是论文数量,梁莹式学术泡沫,恐怕吹不了这么大。

另外,尽管这些年被曝光的学术造假现象不在少数,但几乎都是先由媒体或“网友”“揭黑”,而极少有学校主动自曝家丑。以梁莹事件为例,在曝光前,她就已经有主动删掉自己论文的“前兆”,但并没有引起校方的足够重视。这个过程中,校方是否真的完全不知情,还是抱着侥幸心理采取了“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这其中留下了让人想象的空间。甚至说,如果此事不是被媒体意外曝光,如果没有舆论的施压,校方的最终处置还是否能够如此严厉,也不得不打上一个问号。

所以,这类事件其实引中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学校对于学术不端行为,是否真的具有自曝家丑或者说主动清理门户的勇气?若校方不具有这种意识,甚至把个别教师的学术造假当作家丑,能掩就掩“护犊子”,不仅梁莹式造假“现原形”将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也给了更多教师负面激励。同时,这也对那些真正严肃做学问的教师,构成了不公。由此所形塑的其实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学术生态。其对正常学术土壤和氛围的伤害,不容小觑。

所以,严肃处理“404教授”之余,涉事学校更应该反思,梁莹的“成长”故事,到底折射出了多少学术评价和考核的漏洞,学校内部对于学术不端现象的自净能力,是否真正具备了?在通报中,南京大学还责成相关学院和部门“作出深刻反省和认真检讨,采取切实措施,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希望反省、检讨,能够真正体现为制度化的修复。

观点速递

可怕的不是明星读书少 而是阅读被贬低

虽然略显无奈,但不得不承认,纵然马思纯对张爱玲作品的理解大错特错,也不会对她的演艺生涯产生多少影响。反过来说,阅读虽能使普通人增长知识、开阔眼界,却未必能带来明星般的优渥生活。由此,不难理解为何一些粉丝认为阅读无用一用、不值一提。马思纯不爱读张爱玲,读得对不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阅读的价值不能得到充分肯定。这不仅关乎当下年轻人的三观,更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文化品位。提倡阅读、肯定阅读,不是为了讽刺和挖苦明星,而是为了我们身处处的国家和社会的未来。

——李勤余(《中国青年报》)评马思纯误读张爱玲小说引来嘘声一片



近日,安徽池州一高校,学生必须下载一App扫描二维码才能洗热水澡。这引起学生们各种吐槽,称因操作麻烦,怕把手机淋坏都宁愿少洗热水澡。该校后勤工作人员回应称,已了解相关问题,目前正积极整改。 视觉中国

小朋友给《西游记》挑刺 折射教育理念重要性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是究竟应该怎样挖掘和引导孩子的兴趣,使之成为孩子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的源头活水,仍然是当下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近年来,总有一些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家长,不知疲倦地带着孩子,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兴趣班,仿佛不这样孩子就不会有美好的未来。试问,这些兴趣班真的是孩子的兴趣吗?其实,更为理性的态度应该是以孩子的兴趣为中心,正确葆有孩子的天性,全面契合孩子的心性,合理引导孩子的个性。为此就需要树立尊重的教育理念,把孩子的需要、情感和快乐放在第一位,让孩子成为自我健康成长的真正主人。

——黎姆(《光明日报》)评浙江杭州一小学生指出《西游记》中的“知识漏洞”

ofo 千万人待退款, 创业失败为何用户买单

崔 爽

“小黄车的押金还没退回来”俨然成为一出2018年度收官大戏。从17日起,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互联网金融中心的ofo总部门前排起长龙,寻求线下退款。他们的押金总数从99元到199元不等,加上账户内的少量余额,大概超过200,比一辆小黄车的成本更高。

ofo愈演愈烈的退押金危机反而意外地暴露了这家共享单车企业的用户之众,说是“国民应用”也不过分:在App内在线申请退押金的用户,已经超过千万。

随着ofo陷入困境的新闻持续发酵,退押金难成为这家公司头上散不去的乌云。这几天,乌云下起雨,导火索是ofo承诺的15个工作日退款迟迟无法兑现,有的人甚

至等了两个多月,账户里依然没有收到退款。大家坐不住了,有人坚持在每天早上七点客服热线的时间电话轰炸对方,来回几十通电话终于办成;有的直接在电话中请退款时选择2键“报案”,成功引起对方注意;还有的另辟蹊径冒充老外写信,不仅收回了押金,还额外获赠一封英文道歉信。

看着用户各出奇招,惊讶于民间智慧的同时不免心情沉重:对于用户来说,本来是出于信任选择了某平台却“被套住”,虽然数额不大,但总是利益无端受损,伤钱又伤心。

对于ofo来说,问题显然更严重,作为头顶“新四大发明之一”光环的行业的领军者,和摩拜分庭抗礼的巨头之一,竟如此迅速走到难以挽回的败局。复盘这场为期三年的狂飙突进,可以反省的很多:与竞争对手的疯狂烧钱大战;单车损坏率和维护成

本高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非线性扩张的同时伴随财务、运维等多重隐患;频频曝出的挪用押金行为;投资方的疯狂助推等等。在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同时,行业暴露、制造出的更多问题早已为今天的困境埋下伏笔。

摆摊容易收摊难,对任何一家创业公司而言,死亡都和初创、投融资一样,是创业生态圈的重要一环,虽然它令人不愉快。从发展迅猛时,共享单车行业就伴随着乱停乱放、单车围城、单车“坟场”等问题,长期悬而未决,给城市管理带来负担。如今ofo深陷财务危机,又损害了消费者利益,打击了用户对共享出行领域的信心。所谓退潮之后才知道谁在裸泳,不知这家野蛮生长的企业会如何退场,但无论如何,消费者都不该是为它的疯狂买单的人。

根治手机号码标记乱象 亟待运营商积极作为

眉间尺

近来,有报道称,有些地方政府部门、医疗机构、社区居委会等的电话,在手机上竟被打上了“诈骗”或“骚扰”的标记。而在网上,取消电话标记竟然形成了一条产业链。据报道,湖南某女士的手机被标注为“推销”,与某平台交涉后,花了80元才得以取消标注。清白还要花钱买,真是咄咄怪事。

现在,对来电号码进行标记,几乎已成智能手机的标配。应该说,这本是有助于信息安全的好事。当我们看到陌生来电带有“推销”“广告”“骚扰”“诈骗”等负面标签时,一般都会拒接,有时还会再加一次标记,“坐实”其“坏号码”的身份。这样,依托于互联网搭建的共享平台,大家的经验被汇集和积累起来,确实有望把“坏号码”消灭在网民智慧的汪洋大海之中。

但正所谓“三人成虎”,假话说一百遍就可能被当成真的。有的提供标记服务的网络平台,把标记权完全开放给网民,却在后台开展核实和甄别的工作。当然,从理论上讲,就像大海能清除污染一样,网络也有信息自洁的功能。如果有人恶意对正常号码进行不实标注,终将会被正确的标注所驱赶。但是,目前的标记功能实质上对陌生号码奉行“有罪推定”,除了“快递”“送餐”之外,剩下的“推销”“广告”“骚扰”等标签,都暗示着拒接。而且,这种标记是单向的,当一个手机号码被多次标记之后,即便它是个正常号码,也很难洗清自己的冤屈。如果买到了有过“前科”的号码,就更容易张冠李戴,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正因为如此,消除标记的生意才会兴盛起来,从标记到查询标记来源,再到取消标记,就成了有些人的生财之道。

笔者以为,消除这种乱象有治本与治标两个层面的方法。治标之法是加强标记的真实性,一方面应加强对信息安全的宣传,每个手机用户在给号码打“标记”时,应多一份社会责任感,杜绝恶意,避免随意。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规范相关软件的开发和运营,运营者应健全后台核实和筛查机制,对被标记

“正因为骗子藏在手机里来势汹汹,运营商对此又视而不见,手机号码标记和拦截才作为补救和自救之道应运而生。俗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根治手机号码标记乱象,有待于运营商在打击电信诈骗和骚扰方面积极作为。”

的号码进行检验,还应置入纠正功能,把标记擦除和修改流程变得准确和简洁,从而为信息的真实性提供保障。

更重要的治本之道则是督促运营商真正以用户为中心,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试想我们为什么要对手机号码进行标记?根本上是因为电话骚扰和诈骗就像一块顽固的牛皮癣,多年来屡治不绝。据报道,2016年至2017年,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量呈上升趋势,而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排名第一和第二的诈骗方式即为电话和短信,二者合计站到总数的86.9%。正因为骗子藏在手机里来势汹汹,运营商对此又视而不见,手机号码标记和拦截才作为补救和自救之道应运而生。俗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根治手机号码标记乱象,有待于运营商在打击电信诈骗和骚扰方面积极作为。这在技术上并不存在“卡脖子”的难题,真正卡脖子的可能还是经营理念 and 心态。此外,还应该借鉴国外的一些有益做法,比如对营销电话进行分类和强制标记,推出电话偏好设定服务等,真正把安全、放心的通讯环境还给用户。

大学生当“棒棒”不可耻, 荒废知识才可惜

王钟的

多年前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专业,却一直给人送货的“棒棒”为业,重庆人贺东伟的遭遇被媒体曝光后,引发诸多关注。如今,他也安于做“棒棒”,觉得这是一份和他能力“相匹配”的工作。

大学毕业依旧从事“棒棒”这样的体力活,很多人自然而然地会为文凭与职业性质的巨大落差感到诧异。而一些人潜意识的反反感,迎合了某种“读书无用论”的谬论。贺东伟在干活时,也遭到了同行的笑话,“你看他还是大学生哦”。在不少人的认识里,高等教育就应该与体面的社会地位、丰厚的收入画等号,不然就是知识和教育的失败。

其实,大学毕业当“棒棒”,不能说明高等教育文凭的“掉价”,也不能说明知识“无用”。在许多高学历人才进入低门槛行业的故事中,无用的不是知识,而是当事人受限于身份、文凭外在指标的消极心态。

在成熟的多元化社会里,文凭与工作性质脱钩,应当成为共识。当年,北大毕业生陆步轩卖猪肉的故事,曾引发无数人唏嘘感慨。但后来陆步轩创业成功,还作为优秀校友登上北大的演讲台,又让人们看

到知识的光芒。北大老校长许智宏评价说:“北大学生可以做国家主席,可以做科学家,也可以卖猪肉。”一个人在何种领域从事怎样的工作,并不必然取决于学历和文凭。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文凭也逐步实现了“祛魅”。前不久,延边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生谭超兼职送快递的故事,在网络同样引发热议。但有别于以往,现在没有太多人为博士生送快递感到意外,而更关心他自创快递编号法,提高送货效率的细节。有老师指责谭超:博士生送快递太不像话!谭超的回应铿锵有力:不能通过学历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三百六十行,无论文字哪一行都离不开知识,只要知识发挥了价值,教育的意义就在。因此,与其为大学毕业当“棒棒”感到纠结,不如追问法律专业的“棒棒”有没有发挥知识的价值,有没有恰当地运用知识促进工作。当“棒棒”并不可耻,但任由知识荒废,显然不是什么值得赞许的事。

如果只从报道来看,贺东伟确实辜负了当年所学的法律知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无不透露出无奈感,而且缺乏未来规

划,只打算“一步步看”。这样的心态无疑是限制其人生的重要因素。贺东伟蹉跎的命运,显然不能归结于“错过了工作机会”“没有熟人”等偶然和外生的因素。事实上,只要有心拼搏,勇于尝试和创新,有知识的人从来不会缺少改变命运的机会。

“棒棒”本来是山城重庆独具特色的产业,现如今随着交通环境的改善,“棒棒”逐渐退出江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棒棒”丧失了一切价值。相反,作为一种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棒棒”完全可能在文化传播、旅游开放等领域延续生命力。作为资深“棒棒”,更作为一名有知识的“棒棒”,贺东伟依然不乏改变命运的机会。他为何不能认准时代的趋势,实现自我转型?

大学毕业当“棒棒”,本身并不值得惋惜,更不能得出所谓“读书无用论”的结论。真正值得反思的是,上过大学的“棒棒”,为什么没能通过知识改变手头的这份事业。高学历者能放下身段进入基础性行业本身不算坏事,但不应该只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不管在哪个行业,让知识充分发光发热,才能闯出更广阔的天地。



扫一扫
欢迎关注
科技评论员
微信公众号